



食利者

政治经济学

〔俄〕尼·布哈林 著



商務印書館



食利者政治经济学

——奥地利学派的价值
和利润理论

〔俄〕尼·布哈林 著

郭连成 译

商 務 印 書 館

200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食利者政治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价值和利润理论/
(俄)布哈林著;郭连成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ISBN 7-100-03395-0

I. 食… II. ①布… ②郭… III. ①奥地利学派-
价值论-研究 ②奥地利学派-利润-研究
IV. F091.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842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SHÍLÌZHĒ ZHÈNGZHÌ JĪNGJÌXUÉ

食利者政治经济学

——奥地利学派的价值和利润理论

[俄]尼·布哈林 著

郭连成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395-0/F·421

2002年7月第1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6X

定价: 11.00元

目 录

| | |
|----------------------------------------------------------------------------------------|-----|
| 序 言 | 1 |
| 绪 论 马克思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 5 |
| 1. 德国的历史学派。历史学派的社会学特征及其逻辑特征。 | |
| 2. 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的社会学特征及其简要的逻辑特征。 | |
| 3. 英美学派。4. “奥地利人”的先驱者。 | |
| 第一章 边际效用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 28 |
| 1. 政治经济学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2. 历史观点和而非历史观点。3. 生产观点和消费观点。4. 小结。 | |
| 第二章 价值理论 | 59 |
| 1. 价值问题的意义。2. 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定义。3. 效用与价值。4. 价值量。评价单位。 | |
| 第三章 价值理论(续) | 81 |
| 1. 替代效益学说。2. 边际效益规模与财货量。3. 不同使用方式下的财货价值量。主观交换价值。货币。4. 互补性财货的价值。5. 生产性财货的价值。生产费用。6. 小结。 | |
| 第四章 利润理论 | 121 |
| 1. 分配问题的意义。问题的提出。2. 资本的概念。“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和“利润”。3.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概述; 利润的形成。 | |
| 第五章 利润理论(续) | 144 |

2 目 录

1. 对现时财货评价过高的两个原因:1)不同时期需求与满足需求的手段之间的不同比例关系;2)对未来财货经常评价不足。2. 对现时财货评价过高的第三个原因:现时财货的技术优势。3. “生活基金”(der “Subsistenzfonds”)。现时财货的需求及其供应。利润的形成。

| | |
|---------------------------------------|-----|
| 结束语 | 178 |
| 附 录 理论调和主义(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价值理论) | 184 |
| 后 记 | 196 |

序 言

本书早在 1914 年秋即世界大战开始时就已经写完，而计划撰写的序言则写于这一年的 8、9 月间。

我早就想对最新资产阶级的理论经济学进行系统批判。为此，我在侥幸逃脱流放后就移居维也纳，并开始在维也纳大学受教于已故的庞巴维克。在维也纳大学图书馆，我被迫主要来仔细钻研奥地利理论家们的著作。然而我未能完成在维也纳的写作，因为奥地利政府在战争开始前将我监禁于要塞，而且手稿也被看守人员认真地检查过。在我被放逐的瑞士，洛桑大学图书馆给了我在那里研究“洛桑学派”（瓦尔拉斯）和老牌经济学家的机会，并探究了边际效用理论的根源。同时在那里我也开始研究英美经济学家。然后，政治活动又使我移居到瑞典，这里的斯德哥尔摩“国王图书馆”以及高等商业学校的专业经济图书馆允许我继续研究最新资产阶级经济学。我被捕后被驱逐到挪威，使我转换到克立斯坦尼亚（奥斯陆的旧称。——译者）诺贝尔学院图书馆，而后，即我到美国后，仍然是在当地的纽约“公共图书馆”比较详细地阅读了美国的经济学文献。

在克立斯坦尼亚，我的手稿很长时间不知遗失何方，只是承蒙我的朋友——挪威共产党人阿尔维德·汉森（Arvid G. Hansen）的极力寻找才失而复得，并于 1919 年 2 月带到苏维埃俄国。现在我仅把主要涉及英美学派和近些年整个出版情况的某些见解和注释

2 序 言

写进该手稿。

这就是本书的外部“往事”。

至于事情的实质,可以归结如下:迄今为止,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对最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批判主要归结为两种形式:或者仅仅是社会学批判,或者是纯粹方法论上的批判。例如,确定该理论体系与某一阶级心理相似,就仅此而已。或者指出,一些方法论基础和对问题的态度不正确,因而认为没有必要对体系的“内部”方面进行详细批判。

诚然,如果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理论才可能是客观正确的,那么,单单对该理论的资产阶级性加以揭露这一点,严格说来就足以摒弃这种理论。实际上事情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希望获得普遍意义,正是因为它是最进步阶级的理论体系,而该理论在认识上的“图谋”要比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保守的因而是有局限性的思想更加来势凶猛。然而十分清楚,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例如对与我们敌对的体系的逻辑批判就恰恰应当揭示这个真理。因此,这些体系的社会学特征也绝不能使我们放弃在纯逻辑批判方面进行斗争的责任。

还需要说一说有关对方法的批判。当然,弄清基本方法论基础的错误会推翻整个理论体系。但意识形态斗争力求使方法的错误反映在体系的部分结论的错误中,也就是说,或是反映在该体系内部互相矛盾中,或是反映在该体系的缺陷和“本质上”不能包罗该学科许多重要现象的情况中。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有责任对最新理论全面展开评论,这既包括社会学方面的评论,也包括方法评论和对整个体系及其所有分支体系的评论。连马克思本人也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

学这样提出问题(请比较他的《剩余价值理论》)。

如果马克思主义者通常仅局限于对“奥地利”理论进行社会学和方法论的评论,那么,该理论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就会主要从部分结论不正确的角度来批评这一理论。只有 R. 施托尔茨曼几乎是独自一人试图对庞巴维克全面展开评论。正因为他的某些基本论点与马克思主义有理论共性,所以在评论“奥地利人”方面不难发现相似之处。我认为有必要指出,这种吻合甚至会在我了解施托尔茨曼的著作之前就使我像他一样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尽管施托尔茨曼有那些优点,但他依据的是对社会完全不正确的看法,正如对“专项教育”(“Zweckgebilde”)的看法一样。难怪奥地利理论的一位非常敏锐的拥护者 R. 利夫曼,这位大大深化该理论并着重强调这一理论全部特点的人,会戒备施托尔茨曼,并恰恰去抨击他的目的论。这种目的论的观点连同明显表现出来的辩护腔调,使得施托尔茨曼不能在应有的理论范围内对奥地利人进行分析批评。这项工作只能由马克思主义者来完成,而刊印的概要就是这项工作的尝试。

选择批评对象本身并不需要做长篇说明。众所周知,奥地利理论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强大的敌人。

在欧洲内战正酣之际我决定出版这本著作,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但马克思主义者任何时候甚至在最残酷的阶级搏斗中,只要体力允许,就一定会停止理论工作。如果认为既然资本主义理论的主体和客体在共产主义革命烈焰中马上灭亡,分析研究这种理论是荒唐的,这种反对意见更加不可轻视。这样推论是不正确的,因为了解资本主义体系对于了解目前的局势极为重要。正因为对资产阶级理论的批判为这种了解铺平道路,所以资产阶级

4 序 言

理论的认识价值依然存在着。

关于叙述方法我再说几句。我力图尽可能写得简短些,这样也许叙述起来比较困难。另一方面,我援引了既有奥地利人自己的也有数学家和英美人士等的许多引文。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圈子里对于这种方法抱有很大成见,正如对故作特别“学识渊博”抱有成见一样。然而我认为,这里需要借助一些历史文献来解释,这种解释能顺便使读者熟悉这一科目的书籍,并能哪怕是大致了解这些文献也好。而认识自己的敌人完全无可指责,更何况,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少得可怜。此外注释中(in nuce)还包括对资产阶级理论思想的其他理论分支同时进行的系统批判。

我这里必须向我的朋友尤里·列昂尼多维奇·皮亚塔科夫表示感谢,我与他曾不止一次地一起讨论涉及理论经济学的各类问题。他的宝贵指点总能引起我的注意。

本书献给尼·列同志。

尼·布哈林

莫斯科,1919年2月末

绪论 马克思以后的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1.德国的历史学派。历史学派的社会学特征及其逻辑特征。2.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的社会学特征及其简明的逻辑特征。3.英美学派。4.“奥地利人”的先驱者。

自从19世纪那位其思想成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推动力的伟大思想家永远闭上那双“充满激情的眼睛”后,已经过去了30年。然而近几十年的全部经济进化——资本的疯狂集中和积聚,甚至在穷乡僻壤也发生对小生产的排挤,一方面出现功成名就的强大“工业巨头”,另一方面又增加了“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大军,^①所有这些都极大地证明了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正确性。他把“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作为自己的目标。《共产党宣言》中首次提出的,后来又在《资本论》中得以充分发展的那个预见,已经有十分之九得到绝好的证实。这个预见的最重要部分之一即集中理论,现在已成为老生常谈,并作为公认的真理成为科学常规。诚然,该理论通常被其他理论改头换面,从而丧失了辨别马克思理论的那种严整性。在该理论中仅看到空想家所幻想的那种“经济浪漫主义”,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1页。

当马克思所揭示并阐述的趋势目前急剧迅猛并大规模公开爆发时,则就完全丧失了立足点。只有盲人才看不到大生产的胜利进程。如果某些心地善良的人们只看到股份公司中的“资本民主化”,并多愁善感地把股份公司看成是社会和平与普遍幸福平安的保证(很遗憾,在无产阶级运动的队伍中确有这种人),那么,如今的“经济材料”就会最粗暴地破坏这种小市民阶层的安宁舒适生活,把股本变成一小撮霸占者的强大工具来残酷压制来自“第四阶层”方面的各种前进欲望。仅这一点就已经证明,马克思的理论结构是一种何等重要的认识工具。甚至仅仅现在才登上舞台的这些资本主义进化现象,也只有马克思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够弄清楚。^① 强大的企业家组织、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形成,规模空前的银行机构的产生,银行资本向工业资本的渗透,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整个经济和政治生活中“金融资本”的霸权,所有这些只是使马克思所分析的发展趋势复杂化而已。金融资本的统治只是大大加快推进集中过程,并将生产变成成熟过渡为社会监督的社会化生产。诚然,前不久资产阶级学者宣称,工业家组织将结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并消灭危机。但是,唉!资本主义机体依然是周期性抽搐发作,只有十分幼稚的人们才会说借助于“玫瑰油”可以修补好改良主义的补丁。已经“遍及”整个地球的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即告结束。无产阶级最广泛行动的时期即将来临,其斗争目前已经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对统治阶级采取更大规模施加压力的形式,行将实现运动的最终目标。而且实现马克思理论的基本预言和

^① 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俄译本由伊·斯捷潘诺夫译)在这方面极具借鉴意义。

“敲响资本主义所有制丧钟”的时刻已为期不远了。然而,不论所有这些事实怎样令人信服地说明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想的正确性,但该理论的成就在官方学者中不仅未得到扩大,反而很快化为乌有。如果以前在落后国家(例如在俄国和多多少少在意大利)甚至连大学教授们不反对向马克思卖弄自己,当然是自己“做些修正”和“修改”,但现在整个社会生活的进程,阶级矛盾的激化,各色资产阶级思想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将这些“中间类型的人”撵走,取而代之的是身披普鲁士式、奥地利式或(更加时髦的)英美式理论外衣的“纯欧洲的”、“现代的”学者。^① 资产阶级能够以经济思想的两个主要派别对抗马克思钢铁般的体系:我们指的是所谓的“历史学派”(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克尼斯、施莫勒、比克尔等人),也指最近得到广泛传播的“奥地利学派”(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的学说。这两个派别本身标志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破产。但这种破产表现为两种完全相反的形式。这就是,尽管第一个派别的资产阶级抽象理论的破产表现在对任何类似的一般理论的否定态度上,而第二个派别则相反,它正是要试图构建这种理论,但只是做出一系列异常巧妙的周密考虑的“似是而非的解释”。这类解释首先恰恰是在马克思理论最强有力的那些问题上,也就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问题上遭到失败。众所

^① 这样,这些“新”理论的成就源自变化了的社会心理关系,并非源自这些理论的逻辑完善。憎恨社会主义无疑是资产阶级憎恶劳动理论的原因之一。庞巴维克本人多多少少承认这一点,他写道:“诚然,最初的劳动价值理论我觉得是由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才在几年间得以迅速传播的,但近几年,该理论无疑主要由于‘边际效用’理论的影响而在所有国家理论家的视野中消失了。‘边际效用’理论拥护者的数量不断增加”。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校译的《资本与利润》一书第 415 页的注释。为什么放弃社会主义恰在“奥地利理论”中予以肯定,对此将在下面论述。

周知,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曾竭力探寻最普遍的即“抽象的”经济生活规律的定义。而且像李嘉图这样的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也作出了抽象演绎研究的非常好的榜样。相反,“历史学派”是作为古典派的“世界主义”和“永动主义”(克尼斯)的反对派而产生的。^①这种区别具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古典派的理论及其倡导的自由贸易理论尽管存在着“世界主义”,却是极具“民族性的”理论,这是英国工业所必须的理论产品。由于一系列情况而在世界市场上占据特殊统治地位的英国,不惧怕任何竞争,不需要任何“人为的”即立法措施来战胜其他对手,因此,英国工业用不着吁求“真正英国的”发展条件,以此来证明某些关税刁难是正确的。英国资产阶级理论家们没有必要因此而将注意力集中于英国资本主义的特点:别看他们是英国资本利益的表达者,他们也谈一般经济生活的规律。欧洲和美洲大陆的经济发展则完全是另一种景象。^②与英国相比,德国这个“历史学派”的发源地是个落后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农业国。日益崛起的德国工业最敏感地受到英国竞争的损害,德国重工业尤为遭殃。因此,如果英国资产阶级不需要强调民族特点,德国资产阶级则应当对民族特点加倍注意,以便根据德国发展的“特殊性”和“自家风格”从理论上论证“教育”关税的英明政策。理论兴趣正是要集中在弄清历史上具体的和民

① 克尼斯把“世界主义”理解成是古典派对政治经济规律即对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都适用的规律的看法;把“永动主义”看作是对不同历史时代的类似观点。见克尼斯:《从历史观点看政治经济学》,1883年新版,第24页。

② 可以认为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第一个历史主义理论家(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于1841年出版),他提出了保护关税政策的要求。

族受局限的东西。在理论上选择并提到首位的正是经济生活的这些方面。从社会学角度看,历史学派也是德国资产阶级发展的思想表现。德国资产阶级害怕英国的竞争,要求捍卫民族工业并因此而坚决强调德国“民族的”和“历史的”特点,然后推而广之,包括其他国家的上述特点。从社会遗传学上看,无论是古典派还是历史学派,都是“民族性的”,因为这两个派别都是历史产物和区域有限发展的产物。从逻辑观点看,古典派是“崇奉世界主义的”,“历史派”则是“民族性的”。因此,德国的关税保护主义是历史学派的根源。历史学派在其进一步发展中提出了一系列的细微理论差别,而且以古斯塔夫·施莫勒为首的该学派的一个最重要派别(所谓的“新历史学派”或“历史伦理学派”)具有保守农业的色彩,把过渡的生产形式特别是大地主和农业工人之间“宗法制”关系理想化,害怕“无产阶级的祸根”和“红色危险”,使这些“客观的”教授们露出马脚,并表露出他们“纯科学”的社会根源。^①从这种社会学特征又产生出历史学派的有关逻辑特征。从逻辑方面,“历史派”的特点首先是对抽象理论采取否定态度。深深厌恶这种研究成了他们的主要心态,甚至这种研究的可能性本身也受到怀疑,有时遭到直接否定。“抽象的”一词在这类学者那里视同“无法理解的”意思。一些人开始以怀疑的态度来对待任何科学的最重要概念即“规律”的概念,最多只不过是接受经济史研究和统计研究所揭示

^① 例如,米克拉舍夫斯基给施莫勒做了这样一份“业绩”清单:“他想拖延工人国家保险的实行,反对为农业工人和手工业者推行工人法律保护……他认为对于农业工人来说违反合同可以采用刑法,反对承认工会和工人联合会的权利,并对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法律表示赞成。”(《政治经济学史:19世纪经济学的哲学、历史和理论原理》,尤里耶夫1909年版,第578页。)

的所谓“经验主义的规律”。^①这样一来,害怕广泛总结的狭隘经验主义登上了舞台。学派的极端代表人物亮出口号,宣布要积累具体的历史材料,而建议将理论总结工作放到某个未来时间去做。对历史学派的“晚辈”,其公认的领袖古·施莫勒是这样评述的:“新历史学派与他(即罗雪尔。——作者注)的区别在于,该学派力图不那么匆促进行总结,它感到更强烈地需要由收集一般历史资料转向对某些时代、民族和经济现象的专门研究。它首先需要经济史方面的学术专著,并十分愿意在弄清楚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以前,首先弄清楚某些经济机构的发展。它追求历史法律研究的严格方法,但力求借助于旅行和自己的问题来补充书本知识,同时吸收哲学和心理学研究的资料”。^②

这种与抽象方法根本对立的观点至今仍继续在德国有影响作用。就在不久前(在1908年),还是那位古·施莫勒宣称,“我们在准备和材料搜集阶段还有很多工作要做”。^③

由于具体性的要求,“历史”派别还有另一个特点,这就是,它

① 例如,历史学派的十分温和的拥护者之一诺伊曼说:“在经济领域内根本不存在准确的规律”(《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载于《综合社会学杂志》,由舍夫勒于1892年出版,第48期,第435页)。关于“典型的”概念,该作者写道:“那儿(即在自然科学中。——尼·布哈林注)存在一个典型,从这个典型又产生一个典型并且作为典型被研究。在此(即在社会科学中。——布哈林注)这个典型应该是被设想出来的,也就是说虚构的(见第442页)。”

② 最近历史时期的学派和他的区别在于:这些学派将会推广得很慢,并且他们强烈意识到,由对多年的历史数据收集的需求转向对个别时期民族和经济形势的特殊研究的要求。他们首先渴望一些经济性的专题论著……比起对整个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解释,他们更愿意解释个别经济制度的发展过程。他们以右派历史性研究的严谨方法为出发点,试图通过游访与仔细的查阅去补充书本知识,并且顾及到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施莫勒:《一般国民经济原理概论》,莱比锡1908年版,第119页)

③ 施莫勒,见第123页。

认为社会经济生活完全不能离开生活过程的其他方面,尤其不能与法律和道德相分离,尽管认识的目的迫切要求这种(理论)分离。^①这种观点正是来源于对抽象概念的厌恶:不错,要知道人类社会的生活过程是统一的连续不断的过程,事实上只有一个历史,而不是各种经济史、法律史、道德史,等等。只有科学抽象才把统一的生活分劈为各个部分,同时人为地划分出多种多样的现象,并将其按一定的特征分类。因此,谁反对抽象法,谁就应当也反对经济生活与法律和伦理道德生活的分离。此种观点当然完全站不住脚。无疑,社会生活是一个统一体,这不错。但不应当忘记,如果没有抽象,认识是根本不可能的。概念本身就是对“具体事物”的抽象;任何论述也同样要求按照由于某种缘故而被认为是重要的那些特征来对现象进行一定的选择。因而,抽象是认识活动的必要特征。当具体特征抽象化使抽象概念完全空洞无物即无益于认识时,也只有这时,抽象才不再成为可能。

认识要求分解统一的生活过程。而统一的生活过程如此复杂,以致为研究起见必须将其分解为某些单独的现象数列。如果仅仅因为创造经济生活的人运用语言相互交际而把语文学与经济生活要素同样地包括在经济生活研究之列,那么,研究经济生活的情况会如何呢?很明显,每一门科学都可以利用其他科学的成果,因为这些成果有助于理解该科学的自身对象。但在这种情况下,正是应从本门科学的角度去分析研究这些别的因素,这只是一些辅助材料,仅此而已。

^① 施莫勒提出了学派的三个“基本思想”：“1)对发展观念的肯定;2)心理上和道义上的研究;3)与具有个性的自然规律相比,一个批判性的举止和行为就像是反对社会主义一样。”(见第123页)

因此,把不同种类的材料混为一谈,不仅不便于认识,而且相反,加深了认识的难度。除此以外,在最后一个发展阶段的“历史派”的研究中,其“心理—道义上的研究”采取道德评价和训诫的形式。完全与事无关的道德规范因素闯入以揭示因果关系为宗旨的科学之中(由此而称之为“历史伦理”学派)。①

由于历史学派的活动,出现了大量历史描述性质的著作:价格史、工资史、信贷史、货币史,等等。但价格和价值理论、工资理论和货币流通理论的研究无丝毫进展。其实任何人都清楚,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形:“的确,近30年来在汉堡或伦敦市场上的价格统计是一回事;而加利阿尼、孔狄亚克和李嘉图著作中所阐述的价值和价格一般理论则是另一回事”。②……而否定“一般理论”恰恰是否定作为独立理论学科的政治经济学,是承认政治经济学的破产。

一般说来,科学可以给自己提出两个目标:或是描述在一定地点和一定时间内存在过的或现有的事物;或是努力推论出总是纳入公式的现象规则:如果有了A、B、C,下一个就必须是D。在第一种情况下,科学具有表意性;在第二种情况下,科学具有列线

① 关于伦理学,迪策尔恰如其分地说:“人们演说关于一个道义上的经济原理或者是经济历史,就像演说关于道义上的人类学或生理学等一样好(《理论上的社会经济结构学》,第31页)。还见萨克斯:《国家经济体制的本质和责任》,维也纳1884年版,第52页。瓦尔拉斯也正是这样来嘲笑该理论中的“道德”,将道德说教的企图视同于企图“给几何学赋予精神上的涵义”。(瓦尔拉斯:《社会经济学研究》,1896年,第40页)

② “Altra cosa e infatti la stansuca del prezzi sul mercati d'Amburgo di Londra nell'ultimo trentennio, altra cosa la teoria generale del Valori e del prezzo quale si trova nelle opere del Caliani, del Condillac, del Ricardo”... (Luigi Cossa: “Introduzione allo studio dell'economia politica”, 5~ e edizione, Milano 1892, p. 15).